

《玛纳斯》，一部不断被激活的民族史诗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仅从《史记》中的相关记载计算，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已经超过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柯尔克孜族人民历经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但凭借着民族固有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逐步保存和发展到了今天。柯尔克孜族人民的祖先曾经创造的物质文化遗产被长期的战乱、迁徙、自然灾害所吞灭，遗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其古代思想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却始终与这个勇敢的民族共存，并且留存在他们的口头传统之中。

纵观柯尔克孜族民间口头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那些令人叹为观止、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近百部口头史诗或叙事诗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非物质文化瑰宝。在数以百计的口头文化遗产当中，《玛纳斯》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口头史诗杰作。19世纪，最早对《玛纳斯》史诗进行搜集研究的德裔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表示，柯尔克孜族是最善于用口头艺术表达自己的思想、历史、文化的民族，以口头形式演唱史诗、说唱部落谱系、即兴创作和表演民歌是柯尔克孜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民民间口头遗产的经典之作，是柯尔克孜族人民精神文化的巅峰。千百年来，它在天才的民间史诗歌手“玛纳斯奇”口中不断传唱，并在口头传承过程中不断得到提炼、加工、丰富，日臻完美，逐步走向民间口头艺术的高峰，最终成为今天这样一部篇幅宏大、内容深刻、博大精深的艺术精品，成为千古不朽的民间口头艺术杰作。正因为它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深厚的思想历史价值，于2006年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经过我国政府的申报，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这不仅让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感到无比自豪，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中又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件。

《玛纳斯》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柯尔克孜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蕴含着柯尔克孜族民众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及艺术想象力，用口头艺术的方式体现着柯尔克孜族的文化传统、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彰显着柯尔克孜族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玛纳斯》除了在我国柯尔克孜族民间广泛流传外，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也有流传。

“《玛纳斯》学”开始兴起

《玛纳斯》从19世纪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断得到搜集、记录和研究，到20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科——“《玛纳斯》学”。“《玛纳斯》学”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史诗的调查搜集记录、史诗文本的出版与普及、史诗各种问题的研究。各国学者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在各方面均有卓有成效的业绩；搜集刊布了大量的《玛纳斯》资料，写出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如今，“《玛纳斯》学”在各国学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搜集和刊布我国境内发现的“玛纳斯奇”的演唱资料，并且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使这部沉睡千年的史诗杰作，从我国的帕米尔高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玛纳斯》学”在我国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崭露头脚，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经过各民族学家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引起国际同行们的极大关注，同时也明确认否定了国外学者长期以来认为中国不存在史诗的论点。

从20世纪60年代初，新疆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调查组，开始对《玛纳斯》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文本采录工作，拉开了我国《玛纳斯》工作的序幕。调查组首先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展开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并在该州下辖的各县发现并记录了70多位玛纳斯奇演唱的资料数十万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发现了乌恰县“玛纳斯奇”艾什马特·玛拜特居素朴和阿合奇县“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并且开始集中精力重点记录和翻译他们的演唱资料。其中，仅居素普·玛玛依一人演唱的资料就包括《玛纳斯》史诗6部，共计19万多行。千年史诗《玛纳斯》从此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工作组所采资料的很多片段开始陆续在国内相关刊物上得到整理、翻译和刊布。其中，乌恰县“玛纳斯奇”铁木尔·吐尔杜曼别特的唱本第二部《赛麦台》的片段《赛麦台与阿依曲莱克》，由刘发俊等译成汉文在《天山》杂志1961年第1、2期上发表，同时由阿不力米提·沙迪克翻译成维吾尔文在《塔里木》杂志1961年第1、2、3期上发表。1961年12月14日和15日，《新疆日报》汉文版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片段《阔阔托依的祭典》。1961年根据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第一次记录本译成汉文，由新疆文联出版了内部资料本2卷。1962年在《民间文学》第5期上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四部《凯耐尼木》的汉文译文片段。

可喜的是，当时参加调查工作的人员由汉、柯、维、回、蒙古等多民族的学者组成，充分体现了我国多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完成重大事业的景象。与此同时，也造就和培养了我国《玛纳斯》史诗研究的团队，为后来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准备和研究团队基础。目前，活跃于《玛纳斯》研究前沿的郎樱、胡振华、陶阳等知名学者就是从当年开始从事《玛纳斯》搜集、翻译和研究的佼佼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我国《玛纳斯》搜集和研究工作便立刻重新上马，开始走向辉煌的发展时期。1979年底，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玛纳斯》工作组重新恢复成立，首先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展工作，一年之后又回到新疆文联重新组建了新疆《玛纳斯》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这期间，工作组不仅重新记录了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八部，包括《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乃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索姆碧莱克》《奇格台》等，共计23万行，而且从1984年至1995年，历时11年完成了居素普·玛玛依《玛纳斯》史诗完整的唱本共计18卷本的柯尔克孜文版出版工作。这一成果，立刻成为世界“《玛纳斯》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

除此之外，在史诗资料的搜集方面，我国各民族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采录的史诗文本超过80多个，100万行以上。其中主要有：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八部，共计23万行；艾什马特·玛拜特居素朴唱本第二、三部《赛麦台》，共12200行；由北疆特克斯县玛纳斯奇萨特瓦勒德·阿勒演唱的有关英雄玛纳斯八代祖先的故事等唱本；铁木尔·吐尔杜曼别特、奥斯曼·马特·奥木尔·曼别特、托略·朱马、夏拜·巧鲁·曼拜特阿勒·阿拉曼、萨尔塔洪·卡德尔等80多个玛纳斯奇演唱的、从新疆各地搜集的唱本。这些唱本都各具特色，成为我国“《玛纳斯》学”的基础性资料。与此同时，还整理出版了艾什马特·玛拜特居素朴的史诗第二部《赛麦台》和萨特瓦勒德·阿勒演唱的《玛纳斯祖先的故事》等重要文本。

与此同时，史诗的各种文字的翻译工作也持续不断地进行，并且有很多珍贵资料得到刊载和发表。1979年在《新疆文艺》哈萨克文版（现改名《曙光》）第7期上发表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二部片段；1980年《新疆文艺》维吾尔文版（现改名《塔里木》）第1期上发表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片段《玛纳斯的婚礼》。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长诗集》第一卷中，收入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四部《凯耐尼木》的汉译文片段。198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二卷中再次收入了上述材料。1981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疆民间文学》刊物第1期上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汉译文片段《玛纳斯的婚礼》。1983年该刊物第4期又发表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

二部片段，此片段还在《民族文学》同年第9期上转载。1989年《民族作家》第6期上发表刘发俊等人翻译整理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片段《阔阔托依的祭典》，2006年《民族文学》第8期上刊发了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三部片段《英雄古里巧绕铲除克亚孜》。此外，1982年至1985年由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汇编印发了居素普·玛玛依1979年之后第三次重新演唱的《玛纳斯》前五部的柯尔克孜文内部资料共9册。1991年至1992年由刘发俊主编，刘发俊、朱马拉依·尚锡静、帕孜里等翻译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汉文节译本《玛纳斯》2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贺继宏等主编的《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精品选》（共三卷）出版，其中绝大多数篇章都是《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著名史诗的汉文译文。2009年，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经过各族学者的辛勤努力，人们期待已久的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玛纳斯》汉译文版全译第一部4卷出版。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玛纳斯》八部的完整汉译本将出版。



两部片段，此片段还在《民族文学》同年第9期上转载。1989年《民族作家》第6期上发表刘发俊等人翻译整理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片段《阔阔托依的祭典》，2006年《民族文学》第8期上刊发了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三部片段《英雄古里巧绕铲除克亚孜》。此外，1982年至1985年由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汇编印发了居素普·玛玛依1979年之后第三次重新演唱的《玛纳斯》前五部的柯尔克孜文内部资料共9册。1991年至1992年由刘发俊主编，刘发俊、朱马拉依·尚锡静、帕孜里等翻译的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第一部汉文节译本《玛纳斯》2卷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贺继宏等主编的《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精品选》（共三卷）出版，其中绝大多数篇章都是《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著名史诗的汉文译文。2009年，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经过各族学者的辛勤努力，人们期待已久的由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玛纳斯》汉译文版全译第一部4卷出版。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玛纳斯》八部的完整汉译本将出版。

史诗研究工作取得突破

除了史诗的整理和翻译出版，史诗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玛纳斯》普查搜集工作的逐步展开，对它的评介、研究也逐步展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郎樱所说的那样，我国的《玛纳斯》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初步介绍开拓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不断深入研究并逐步取得一定学术成果的阶段。在第一阶段里，值得一提的评介性或研

究性文章主要有：

刘发俊、太白、刘前斌合写的《柯尔克孜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文学评论》，1962年4月）。胡振华发表的《柯尔克孜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柯尔克孜苏报》维文版，1979年1月25日）、《英雄史诗〈玛纳斯〉》（《民间文学》，1962年5月）、《柯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及其研究简况》（《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3月）、《国内外“玛纳斯奇”简介》（《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3月）、《关于〈玛纳斯〉产生的年代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1月）。尚锡静发表的《〈玛纳斯〉艺术特色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0年3月）、《论〈玛纳斯〉人物的形象塑造》（《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1月）。刘发俊发表的《论史诗〈玛纳斯〉》（《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3月）、《史诗〈玛纳斯〉的社会功能》（《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6月）、《史诗〈玛纳斯〉搜集、翻译工作30年》（《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5月）。张彦平发表的《论玛纳斯形象早期神话特质》（《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4月）。《原始信仰与柯尔克孜族古代叙事长诗》（《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5月）、《〈玛纳斯〉与玛纳斯奇》（《新疆艺术》，1990年1月）。郎樱发表的《〈玛纳斯〉与萨满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1月）、《〈玛纳斯〉的叙事结构》（《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4月）、《〈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2月）。萨坎·奥穆尔发表的《关于柯尔克孜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0年4月）。陶阳发表的《〈玛纳斯〉与萨满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1月）。张宏超发表的《〈玛纳斯〉产生时代与玛纳斯形象》（《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3月）。李琪发表的《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新版本》（《新疆社会经济报》，1984年3月4日）。

在这一阶段，我国《〈玛纳斯〉学》正处于开拓时期，史诗文本还没有出版发行，所以这些研究文章都是学者们凭借自己的理论功底和对材料的熟稔写出来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我国“〈玛纳斯〉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玛纳斯〉学》正处于开拓时期，史诗文本还没有出版发行，所以这些研究文章都是学者们凭借自己的理论功底和对材料的熟稔写出来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我国“〈玛纳斯〉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玛纳斯〉学》正处于开拓时期，史诗文本还没有出版发行，所以这些研究文章都是学者们凭借自己的理论功底和对材料的熟稔写出来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我国“〈玛纳斯〉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有关《〈玛纳斯〉学》的研究也开始出现。1990年，郎樱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探讨《〈玛纳斯〉学》的奠基之作。此后，郎樱又分别在1991年和1999年先后推出了《〈玛纳斯〉论析》和《〈玛纳斯〉论》两部论著，把我国的“〈玛纳斯〉学”不断向前推进。

郎樱一生执著地开展对《〈玛纳斯〉学》的研究。她从1964年开始与《〈玛纳斯〉》结缘，参加史诗的搜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在数十年的工作实践中，不仅搜集翻译了大量文本资料，多次奔赴新疆南北广大柯尔克孜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凭着对《〈玛纳斯〉学》以及对柯尔克孜族文化的满腔热情，凭着自己深厚的理论功底，经过不懈努力和探索，陆续写出了有关的研究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2011年，她得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颁发的“达纳克尔”勋章。

除了郎樱，还有胡振华、陶阳、尚锡静、潜明

兹、马昌仪、张彦平、张永海等各民族学者都对《〈玛纳斯〉学》加以关注，潜心研究，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我国的“〈玛纳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胡振华也在柯尔克孜族语言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获得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颁发的“〈玛纳斯〉勋章”等荣誉。近几年来，“〈玛纳斯〉学”继续发展着，曼拜特·吐尔地的《〈玛纳斯〉》等多种异文及其说唱艺术、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

萨克合著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撰写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等几部专著，从史诗文本、口头传统、史诗歌手等不同侧面面对《〈玛纳斯〉》进行了研究。

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为以口头形式演唱的活形态史诗杰作，《〈玛纳斯〉》深深植根于柯尔克孜族民间，融入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体现了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最值得珍视的是，《〈玛纳斯〉》史诗目前还依然以口头形式在我国广大柯尔克孜族聚居区以及国外的一些柯尔克孜族地区传唱。天山南北的阿合奇县、乌恰县、阿图什市的哈拉峻乡、吐格买提乡以及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县、昭苏县等都依然活跃着演唱《〈玛纳斯〉》的歌手，他们在民众中演唱史诗、传播史诗，固守着祖先的这一精神家园。尤其是被称为“〈玛纳斯〉的故乡”的阿合奇县，不仅拥有被称为“当代荷马”的居素普·玛玛依，而且还有数十位各年龄层的大小玛纳斯奇，该县目前已经将《〈玛纳斯〉》演唱活动同驯鹰、库木孜琴弹唱、民间对唱以及赛马、叼羊等活动发扬光大，打造出了相关的民间文化品牌。

随着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玛纳斯〉》史诗歌手中有居素普·玛玛依等3人被定为国家级传承人。其中，居素普·玛玛依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终身成就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文艺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他还曾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授予“玛纳斯一级勋章”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演员”称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玛纳斯〉》进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不断深入，新疆各级政府部门一方面加强史诗的保护工作，在原有的新疆文联《〈玛纳斯〉》研究室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区及县级《〈玛纳斯〉》保护中心，并且在新疆师范大学成立了新疆《〈玛纳斯〉》研究中心；另一方面倾力打造《〈玛纳斯〉》文化品牌，已经连续多年举办了“新疆《〈玛纳斯〉》国际旅游文化节”，大大提升了史诗的知名度。居住在黑龙江富裕县及周边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也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建造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玛纳斯〉》史诗文化长廊”，使《〈玛纳斯〉》的深厚文化底蕴在我国东北柯尔克孜族地区也生根开花结果。

伴随着《〈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的广泛传播和普及，以及其唱本完整的柯尔克孜文版、吉尔吉斯文版以及汉译文的出版发行，《〈玛纳斯〉》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吉尔吉斯斯坦、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陆续翻译居素普·玛玛依的史诗唱本。在我国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玛纳斯〉》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版，以及英文版、德文版也开始进入日程。

英雄史诗早就被誉为划时代的口头文学形式，是人类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精神文化的高峰，是人民伟大的文化创造的具体体现。它是民族的骄傲，又是世界人民共有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伴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是特定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知识总汇，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玛纳斯〉》作为柯尔克孜族人民的民族魂，是柯尔克孜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独一无二的纪念碑和文化创举，是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我国多民族文学花园中不朽奇葩。

这部世代以口头形式传唱的史诗杰作已被载入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中，被编入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呈现出独特魅力。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有党政各級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各民族学者共同参与和不断开拓进取的决心，这就为史诗《〈玛纳斯〉》的传承、保护、研究、宣传、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保证。我们坚信，我国的《〈玛纳斯〉》工作一定能够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南方民族，是我国23个有古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秦汉时起，壮族人就开始学习接触汉字。到了唐宋时期，学会汉字的壮族文人根据汉字的形、音、义的构字规律，仿效汉字六书构字方法，借助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方块壮字，但主要用于唱本、族谱、经书和契约的书写。1955年，壮族首次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57年，国务院批准并实施了《壮文方案》。

壮族地区是以稻作文化为主，壮族称为“那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壮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石器、花山崖画、铜鼓、歌圩、壮锦、绣球、壮剧、干栏、壮医药等被看做“壮文化”的代表。长达一万行的创世史诗《布洛陀》是壮族文化的集中体现。现在，以布洛陀和刘三姐为代表的壮族文化，仍然在广大壮族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片壮族人休养生息的土地，曾经历过无数次外敌侵扰，但英勇的壮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进入近代以后，壮族地区先后经历了马神甫事件、抗法战争、金田起义、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壮族人民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美丽的壮乡也养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和革命者。

得益于悠久历史文化的孕育与催生，壮族的文学艺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壮族文学最初的形式是口头文学，它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目前已出版多种壮族故事传说。口头文学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一批有文学天赋和语言才华的作家诗人脱颖而出，

植根于传统的壮族文学

□黄佩华(壮族)

歌剧和电影《刘三姐》、叙事长诗《白鸟衣》就是壮族文学的扛鼎之作。

和许多兄弟民族文学的生命轨迹不一样，壮族文学虽然也经历了从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再到文人文学的历程，但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广大壮区依然保持着文人文学和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共生共荣的状态。受汉文化的影响，从唐代开始壮族就有了自己的文人和作品，一批地方首领和地方名人开始写诗作赋。到了明清，更是进入高峰，不仅文人数量增多，作品数量和水平都有较大的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唐代以后壮族作家创作的诗歌，至今保存有2万多首，其他文学作品达30多种。

现当代的壮族文学和以前历代相比，都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比较活跃的壮族作家队伍，一大批作家加入了各级作协，成为壮区文学创作的主力。壮族有谚语说，男人要么去扛枪打仗，要么拿笔写文章。作为一名壮族人，我没有能像我的祖辈那样去扛枪打仗。我出生